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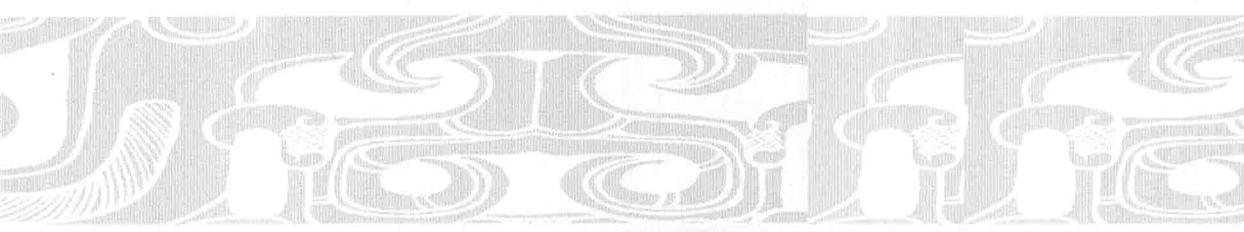
# 魏晋南北朝

## 社会生活研究

刘春香 ◎著



人民出版社



#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研究

刘春香◎著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研究/刘春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01 - 012866 - 5

I . ①魏… II . ①刘… III . ①社会生活—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 ①D691.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0895 号



刘春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2866 - 5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基地许昌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系列学术成果

# 目 录

<b>第一章 生态环境</b> .....	1
第一节 自然环境状况 .....	2
第二节 生态环保思想 .....	6
第三节 生态学知识的应用 .....	21
<b>第二章 饮食文化</b> .....	29
第一节 食文化 .....	29
第二节 酒文化 .....	48
第三节 茶文化 .....	58
第四节 饮食典籍及饮食娱乐活动 .....	64
<b>第三章 居处状况</b> .....	74
第一节 居室 .....	74
第二节 家具 .....	79
第三节 家用什物 .....	90
<b>第四章 旅行活动</b> .....	107
第一节 旅行食宿 .....	109
第二节 旅游活动类型 .....	113
第三节 旅游文学 .....	120
第四节 旅行活动兴盛之原因 .....	125

<b>第五章 医药卫生</b>	128
第一节 医政及医务体系	129
第二节 卫生保健及疾病预防	136
第三节 主要病种与病例	143
<b>第六章 社会保障</b>	154
第一节 灾害救助与保障	154
第二节 社会弱者救助与保障	168
<b>第七章 商业经营</b>	178
第一节 商人经营之道	178
第二节 集市贸易	187
第三节 市场管理	197
第四节 经营策略	201
<b>第八章 民间信仰</b>	206
第一节 巫觋	206
第二节 淫祀	217
<b>第九章 妇女生活</b>	222
第一节 妇女与政治军事	222
第二节 妇女与经济活动	227
第三节 妇女与文化艺术	232
第四节 妇女与婚姻家庭	237
第五节 妇女与社交	242
<b>参考文献</b>	245
<b>后记</b>	250

# 第一章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因素之一，它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生态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负反馈效应。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的深切关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保问题更为突出，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回过头去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上的环保问题，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及可持续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活环境如何，存在哪些环境问题，当时人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哪些值得思考和借鉴的东西，本章略作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凋敝，州郡萧条，城市成为丘墟，同时也导致了毁林严重、灾害频仍等生态的破坏和空气污染等环境质量下降的问题。南方虽然相对较为安定，经济得到开发，然而在开发和发展的背后，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当时人们对自然改造认识的不足，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生态破坏、大气污染等问题。环境问题的严重危害，促使人们环保意识的自觉和加强，并采取了保护土地资源、开发水利资源、保护林木动物等一系列措施，在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自然环境的作用。

## 第一节 自然环境状况

### 一、森林多遭毁坏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作为能量生产者的植物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中心的地位，就能量循环来说，植物是能量生产者，而人和其他动物则是消费者，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以植物的生产为基础。森林作为高等植物系统，不仅为人类及其他动物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能量即食物来源，同时为之提供庇护所及其他生存资源。同时，森林在调节气候、涵蓄水分、净化空气、保持土壤，防止乃至遏制水、旱、风等气候性灾害等方面，也发挥着其他生态因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10万亩的森林所涵养的水量，相当于一个库容量为200万立方米的水库，因而森林又有“天然水库”之誉。森林虽然有一定的恢复再生能力，但过度破坏则可以使这种能力丧失，最终导致一系列的生态灾难。所以，森林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关键性的，森林资源的耗竭，终将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乃至全面崩溃。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诸多原因，森林毁坏相当严重，森林覆盖率大为下降，成为这一时期水旱等灾害多发的主要人为因素之一；再加上其他因素，使生态条件更趋脆弱，以致陷入灾害破坏生态、被破坏的生态又引发灾害这一恶性循环的泥潭中。

森林的毁坏，早在秦汉时期已相当严重，自曹魏始，经晋至南北朝，森林更是遭到不断破坏。这一时期关中平原地区大片的森林已不太多，而长江流域的经济资源由于在六朝时被大规模地开发，使平原丘陵地区的森林植被开始遭受破坏。

当时，破坏森林的方式有多种，如为了垦殖而砍伐、铲除和焚烧森林，人们为得火田之利，拼命滥伐滥焚；木材的消耗对森林的破坏，诸如薪炭消

耗、棺木用材、建筑用材、手工业用材、水利设施、交通工具、武器及各种生活用品、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燃料用材，等等，皆需消耗大量木材，尤其是生活中的燃料用材，更成为经常性的消耗；再如统治者经常建造规模宏大的宫室，木材的消耗量也非常之多，如《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载：太兴三年（320年），石勒计划仿造洛阳的太极殿而修筑建德殿，“遣从事中郎任汪帅使工匠五千采木以供之”，派出五千人的采木队伍，可见耗木之多；战争对森林的毁坏也尤为严重，魏晋南北朝时期，兵戈不休，多数战争都是以大量的林木消耗为前提的，特别是由于战争需要所采用的火攻更是大面积地毁坏森林，如著名的火烧博望战役、陆逊火烧刘备连营七百里的夷陵之战，又如南朝梁武帝派20万人筑浮山堰，用木料做方框，中填大石，再加上土，企图以此雍遏淮水，灌没北魏的寿阳城，这种用于战争的大型工程必然要毁掉大片森林，同时，战祸在破坏了广大地区社会生产的同时，也摧毁了战乱地区的山林植被，使战乱地区的生态失去平衡，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出现了水土流失，旱潦时有发生，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傅筑夫先生通过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当时生态平衡被破坏的情况：“城镇村落被夷灭，树木林莽被砍烧，井渠沟洫被湮塞。结果土地裸露，水土流失，造成大地沙漠化，旱则赤地千里，黄沙滚滚；潦则洪水横流，浊浪滔天。”<sup>①</sup> 可见，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繁，除气候等自然因素外，人为的破坏使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也不应忽视；另外自然灾害对森林的破坏也相当严重，如《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载：后赵太兴二年（319年），“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溢，冲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由于大雨，滹沱河水猛涨，泛滥成灾，冲陷山谷，洪水拔起冲走的巨木漂浮于滹沱河上，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同书又载后赵建平二年（331年）九月，“时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漂流巨木百余万根，集于堂阳”。其他如关中渭水平地，也时有洪水漂流的大量木材。又《魏书》卷六六《崔亮传》载：“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稠密区，由于大量的林木被砍伐，开始出现童山秃岭

<sup>①</sup>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的惨象，中原很多地区“百姓苦乏木材”<sup>①</sup>，可见森林毁坏之严重。

## 二、环境污染加重

当时城市环境污染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噪声、灰尘、烟雾、废物及废水污染等。左思《吴都赋》云，建康城早在孙吴时已是“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闌闌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坐。纻衣绨服，杂沓儻萃。……交贸相竞。喧哗喧呷，芬葩荫映。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霖霖而中逵泥泞”。<sup>②</sup> 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轂叠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咷宇宙，嚣尘张天，则埃燭曜灵。”<sup>③</sup> 又鲍照《芜城赋》所云广陵（今江苏淮阴）“全盛之时，车挂轤，人駕肩，塵闊扑地，歌吹沸天。擎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土马精妍”。<sup>④</sup> 虽然是一幅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闹市景观，然而，从这繁华的场景里，我们同时也感受到尘埃、噪音问题的严重性。以前人们只是从文学角度注重对社会繁华的描述，其实，这里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即在这繁华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矿冶铸业有较大发展，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而矿业的大规模开采、冶炼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特别是煤在魏晋以后作为生活和冶炼生产中广泛使用的燃料，对人身以及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如晋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sup>⑤</sup>，人们已经认识到燃煤所产生的烟气会伤人。

另外，在历史上，屡有江河湖池及井水发红、变黑及发臭的记载，但原因多难以考证。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记载，如《晋书》卷二八《五行中》

<sup>①</sup>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

<sup>②</sup> （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卷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8—89页。

<sup>③</sup> （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9页。

<sup>④</sup> 吴云主编：《汉魏六朝赋精华》，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sup>⑤</sup> 《太平御览》卷六〇五《文部二十一》引。

载：“（晋）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鲁国池水变赤如血。”同书卷二九《五行下》载：“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池水皆赤如血。”《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永元元年（499年）“秋七月辛未，淮水变赤如血。”《隋书》卷二三《五行下》载：“（南朝）陈太建十四年（582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荆州。祯明中，江水赤，自方州，东至海。”又“祯明二年（588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又“后周大象元年（579年）六月，咸阳池水变为血。”这些水不明原因的变赤、变黑，有被污染的可能。

### 三、灾害频繁发生

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对我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化的系统研究及其他学者的成果显示<sup>①</sup>，中国近5000年的气候变化过程可以划分出四个温暖期和与之相间的四个寒冷期。自东汉开始，历魏晋至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三国时期气候已很寒冷，黄武四年（225年），魏文帝曹丕曾观兵广陵（今江苏淮阴），由于天寒地冷、淮河结冰，10万大军的军事演习不得不临时取消<sup>②</sup>；东晋时期的气温达到了自东汉以来的最低点。寒冷往往导致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蝗灾、风暴、大霜、稻麦不熟等灾害频频出现，并且经常伴之以瘟疫流行。由于我国的黄河流域地处北纬30—40度之间，正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故魏晋南北朝时期严重的干、寒及其他灾害也多集中于这一地区。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灾害，邓云特有较为全面的说明：“终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中，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疾疫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以言旱灾，则二百年间，见于史书者，凡六十次；以言水灾，亦达五十六次。至于风灾，共达五十四次；次为地震，计五十三次，频度亦密；再次为雨雹之灾，计亦五十三次。此外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他如霜雪、‘地沸’，各

<sup>①</sup> 见杨载田等：《地理环境对魏晋人文风度的影响》，《中国地理》1994年第4期，第104—106页。

<sup>②</sup>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仅两次，不足述矣。”<sup>①</sup> 又南北朝时期，“所见之灾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疠诸灾，总共达三百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之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年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七次；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歉饥十六次。”<sup>②</sup> 加上此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已，自然生态也遭到极大破坏，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森林被大量采伐，导致生态破坏及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造成很大影响。

## 第二节 生态环保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环境问题的严重危害，促使人们环保意识的自觉和加强，并采取了保护土地资源、开发水利资源、保护林木动物等一系列措施。一些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秉承中国传统生态环保意识的有益成分并进行积极探索，他们有关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态命题的诸多合理见解，诸如天人和谐的生态哲学思想；泛爱万物、宽刑育物的生态伦理思想；调适自然、改善环境的生态建设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 一、“泛爱万物，宽刑育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一些伦理道德观念，被道家、儒家用于考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之中。《道德经》的宗旨就是贵无，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无欲无争；强调方其无，才有有，贪婪无度，终则一无所有。如提倡对自然万物

---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3 页。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5 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sup>①</sup>，即生长万物而不占有，抚养万物而不自恃，长养万物而不主宰，这就叫“玄德”；要求人们“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就是要辅助万物自然发展而不敢勉强作为；又说“天之道，利而不害”<sup>②</sup>，即自然的法则，就是利物而不害物。庄周及其弟子们则提出人的仁爱之心应当更为宽泛，对天地万物都要具备爱心。《庄子·天下》认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sup>③</sup>应该无差别地去爱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因为天地万物都是一样的。《庄子·天地》说：“爱人利物之谓仁。”<sup>④</sup>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等主张，也就是要扩展“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孔子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sup>⑤</sup>，显然，道家、儒家学派是把无欲、仁爱等伦理观念实施于生态环境的。史书上记载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也体现了古人善待自然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统治者和广大民众承袭古代哲学中所构建的“生态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蕴含着有益的生态保护意识。

### （一）泛爱万物意识

泛爱万物意识意指对天地万物都要具备爱心，加以保护。具体到自然环境方面，主要是对土地、水源、林木植被、鸟兽鱼鳖等各种生物资源取之有节，反对过度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

#### 1. 土地资源的保护

自古以来人们皆知，土地是天下之根本，因而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环境要素和一切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而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安排土地用项。这一思想和做法源于先秦，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生产潜力。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多样化的农作制就是合理利用土

<sup>①</sup> 饶尚宽译注：《老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页。

<sup>②</sup> 饶尚宽译注：《老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页。

<sup>③</sup> 孙通海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3页。

<sup>④</sup> 孙通海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8页。

<sup>⑤</sup> 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7页。

地的见证。此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二年三熟制，江南地区则发展了一年二熟制，在水热条件特别好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一年三熟制。如湖南便县（治湖南永兴县）界有温泉水，“左右有田数千亩，资之以溉。……温水所溉，年可三登”。<sup>①</sup> 另外，间、混、套作和复种轮作一样，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阳光能的重要措施。《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多种间、混作方式：林、粮间作有桑苗下“种绿豆、小豆”，“绕树一步散芜菁子”<sup>②</sup>；蔬菜间作有“葱中亦种胡荽”等。<sup>③</sup> 混播已用于饲料生产，“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sup>④</sup>。套作也有初步发展，“六月间，可于麻子地间散芜菁子而锄之，拟收其根”<sup>⑤</sup>。《齐民要术》的记载反映出人们已认识到间、混、套作中作物与作物、作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采取了正确的作物组合和田间配置方式。

精耕细作，保护耕地。精耕细作制度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汉已相当成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耕作制度由于将用地和养地相结合，使地力久种不衰。当时人们主要是通过耕作和施肥两个环节来培肥地力。种植绿肥即是以田养田的一种有效措施。人们已从以前的“掩埋青草”作为绿肥发展到有意识地栽培绿肥。《齐民要术》引《广志》云：“苕草，色青黄，紫华（花）。十二月稻下种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sup>⑥</sup> 北魏时期，北方已广泛利用栽培绿肥以培养地力，《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绿肥作物有绿豆、小豆、芝麻之类，并说利用绿肥与施肥有一样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齐民要术》对各种绿肥作物的肥效还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sup>⑦</sup> 当时

<sup>①</sup>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九《耒水》，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页。

<sup>②</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sup>③</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种葱第二十一》，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sup>④</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sup>⑤</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种麻子第九》，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sup>⑥</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五谷、果蔬、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页。

<sup>⑦</sup>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第一》，团结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的绿肥耕作有茗、稻轮作，绿豆、小豆、胡麻与谷子轮作，还有与瓜、葵等蔬菜轮作的。这时绿肥轮作制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人们对绿肥肥效有了相当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利用土地、挖掘土地潜力的重要性。这些做法，虽然是当时人们出于增产增收的目的，但他们已有了自觉的环保意识，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 2. 水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水利灌溉事业是农业经济的命脉，直接影响农业收成，并且是农业生产力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水利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受到重视，其特点，一是灌溉与漕运相结合；二是注意整顿治理故田及小型陂塘水利工程；三是重视水利设施的管理。

灌溉与漕运的结合。曹魏齐王芳正始四年（243年）“（邓）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sup>①</sup>

治理陂塘。由于当时农田用水的陂堨塘堰甚多，这些工程不仅占地多，且因工程简陋，不能防洪。再者，洪水过后，陂堨已被破坏，又带来干旱的威胁。所以，晋初朝廷提出按照质量进行修缮的处理意见。“其汉氏（指东汉）旧陂旧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善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sup>②</sup>“句章县有汉时旧陂，毁废数百年”，东晋时孔愉“修复故堰，溉田二百余顷，皆成良业。”<sup>③</sup>

水利管理。当时一般的水利设施都有一套管理办法，如杜预在荆州修复邵信臣旧有水利设施后的刊石立碑，约束用水。官方有专门官员负责水管

<sup>①</sup>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sup>②</sup>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sup>③</sup> 《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理，如曹魏“都水使者”，晋代“河堤谒者”。当时对水利的重视程度可说是与农业相同。另外，拆除有害于水利的一些设施，也起到了保护水利的作用，特别是拆除水碓磨房等随意阻遏水流、水量、水势的设施。如《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刘颂为河内太守，“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转为侵害，颂表罢之，百姓获其便利”。通过这些措施，使水利资源得到了合理的开发与较好的保护。

### 3. 森林资源的保护

首先是保护森林。森林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已注意到森林毁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已引起统治者及有识之士的重视。魏明帝即位后，令陈群等删节汉律，制定《魏律》180篇，其中《治民》18篇中就有“贼伐树木”的刑律。而西晋初订定新律，其中也有禁止破坏陵园草木的内容<sup>①</sup>，此时，人们对森林毁坏与水土流失的关系有精确的描述。咸宁二年（276年），杜预上疏晋武帝，详述毁林之恶果。他指出：“陂竭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sup>②</sup> 杜预认为，粗放滥垦、火耕水耨和水利设施（陂竭）年久失修是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根本原因。

东晋和南朝也多次颁布禁止私占山林、乱砍滥伐的法令。晋成帝曾下诏禁止擅占山泽，违者以强盗律论。梁武帝时，针对各地森林多有破坏的情况，诏曰：“又复公私传、屯、邸、治，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视。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致细民措手无所。凡自今有越界禁断者，禁断之身，皆以军法从事。若是公家创内，止不得辄自立屯，与公竞作，以收私利。至百姓樵采以供烟爨者，悉不得禁。及以采捕，亦勿呵问。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正。”<sup>③</sup> 希望通过实行严厉的制裁来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不法行为。朝廷不仅重视森林保护，一些地方所设立的乡规民约，

<sup>①</sup> 李飞等：《魏晋南北朝林政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sup>②</sup>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sup>③</sup>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如“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sup>①</sup>也反映出普通民众所具有的森林保护意识。

其次是植树造林。当时，人们因多受森林毁坏之患，故统治者多提倡植树造林。曹魏文帝时，郑浑为山阳、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木材，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sup>②</sup>，这种植树的效益既有经济的——“民得财足用饶”，又有环境的——“村落齐整如一”。宋文帝积极倡导植树，多次下诏鼓励蚕桑，元嘉八年（431年）诏曰：“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政府提倡发展经济林木。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下诏：“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劝导播殖，蚕桑麻棨，各尽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sup>③</sup>南齐武帝时也下诏鼓励农桑，并将其与官员的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如永明三年（485年）诏曰：“守宰亲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若耕蚕殊众，足厉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违方骄矜，佚事妨农，亦以名闻。将明赏罚，以劝勤怠，校核殿最，岁竟考课，以申黜陟。”<sup>④</sup>地方官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sup>⑤</sup>。沈瑀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sup>⑥</sup>。梁武帝诏开山林薮泽之禁，劝民种植桑果，“将使郡无旷土，邑靡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sup>⑦</sup>前秦时，“王猛整齐风俗，……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sup>⑧</sup>这不仅反映了当时行道植树的盛况，而且也反映了植树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

<sup>①</sup> 《册府元龟》卷八百七十九《总录部·计策第二》。

<sup>②</sup> 《三国志》卷十六《魏书·郑浑传》。

<sup>③</sup> 《宋书》卷五《文帝纪》。

<sup>④</sup> 《南齐书》卷三《武帝纪》。

<sup>⑤</sup> 《南齐书》卷二九《刘善明传》。

<sup>⑥</sup> 《梁书》卷五三《沈瑀传》。

<sup>⑦</sup>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sup>⑧</sup> 《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